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务大辞典

孙维本 邵奇惠 主编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ZHENGWU DACIDIAN

(黑) 新登字第 1 号

责任编辑: 吴海林 肖尔斌

田兆民 吕观仁

封面设计: 张若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大辞典

Zhong Hua Ren Min Gong He Guo Zheng Wu Da Ci Dian

孙维本 邵奇惠 主编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长春新华印刷厂制版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科技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264 插页16

字数: 8 600 000

1992 年10月第 1 版 1992 年10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 000

ISBN7-207-02309-X/D·344 定价: 218. 00 元

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 建国以后,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得到迅速发展。全国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包括社科院系统、党校系统、高校系统、军事院校系统和实际工作部门五大系统。到1986年,全国有社会科学研究所542个,专职研究人员1.8万余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一大批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当代中国的社会科学的开拓和发展起到奠基作用。在马列经典著作的出版方面,《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已出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已出版20卷,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各4卷。《毛泽东选集》出版了1—4卷。这一时期出版了一大批学术专著和数以万计的学术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呈现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局面。从1966年到1976年,即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科学研究受到林彪、“四人帮”的肆意践踏,几乎陷入完全停滞的境地,大批专家学者受到打击和迫害。1976年粉碎“四人帮”到现在,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经过拨乱反正、揭批“四人帮”的罪行和开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从指导思想上纠正了“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恢复和发扬了实事求是的作风。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思想得到解放,社会科学研究事业得到发展。主要特点:(1)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科研机构增加,研究队伍壮大,学术讨论活跃和成果的丰硕。无论专著、论文、译著、译文还是各类工具书、古籍整理、文献索引编制等科研成果,都远远超过“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总和。同时各种学术团体纷纷恢复和新建,社会科学学术团体目前已达300多个。国际学术交流也空前活跃,仅

1979—1986年,我国社会科学界接待外国来华访问学者1000多批次,3000多人。派学者出访、交流和进修接近1000批,2000余人。(2)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方针,努力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克服了教条主义的影响,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进行科学的探讨。在真理标准问题、马克思异化概念问题、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问题、经济发展战略问题、民主与法制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了理论的论证和政策方面的建议。(3)思想活跃,争鸣热烈。克服了极“左”思潮,摆脱了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束缚,学术界思想大解放,“双百方针”得到充分贯彻,鼓励社会科学工作者进行大胆的探索和创新,使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都有新的突破。(4)拓宽了研究领域,新兴学科异军突起。对传统学科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一些过去遭批判、受冷落的学科近几年有了长足发展,对台湾、港、澳的研究,对世界各地区和国别的研究有了新的加强。众多的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如领导学、科学学、未来学、创造学、潜科学、思维学等纷纷建立。传统学科中也出现许多新的分支,如经济学中分出数量经济学、消费经济学、技术经济学等。(5)在哲学社会科学各层次上对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进行了广泛的探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突变论、协同论等都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有方法论的意义。综合创造法、追踪法、类比法、还原法、反求法、比较异同法、立体思考法、系统想象法、模糊法等都不程度地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在比较研究中,总体比较、平行比较、交叉比较、内部比较、外部比较、历史性比较、逻辑性比较等方法也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有所应用。

【中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研究和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创造了空前有利的条件。1949年建国到1956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毛泽东同志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著作、党的文献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的真实记录。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学者研究和总结中国过渡时期经验的专著和论文是这一时期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中形成了干部和群众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热潮。中共中央成立了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翻译和出版了马恩列斯一些著作。1951—1953年出版了《毛泽东选集》1至3卷。中国科学院成立了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创办了《学习》杂志等理论刊物,还组织干部学习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高等院校普遍开设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和中共党史课,有的院校设置了专门的科、系,培养从事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才。从1957年到1966年,是社会主义事业在曲折中前进的10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也取得了成绩。学术界对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等理论问题进行了研讨,撰写了一批马列主义教材。在马列主义研究方面开始摆脱苏联模式和观点的束缚。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队伍有所扩大。“大跃进”时期,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在学术界的论著中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均有反映。有些专家学者坚持正确意见,反而受到批判。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是“文化大革命”的10年。正常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被迫中断,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被打乱,大批马克思主义学者遭迫害和批判,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被歪曲。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党领导中国理论界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取得了重大成绩。但是当时党的领导推行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阻碍事业的前进。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实践检验真理标准的科学论断,为全国人民和理论工作者指明了方向。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全国掀起讨论真理标准的热潮。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恢复了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揭开了新的篇章。十余年来广大理论工作者在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思想空前活跃,研究队伍有了发展,成果超过建国以来前30年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已出齐,《列宁全集》第三版基本出齐。《毛泽东选集》1—4卷重印,《邓小平文选》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著作也出版了一大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研究领域拓宽了,禁区被突破了。研究机构和

学术团体纷纷建立和恢复,大批专著和论文纷纷问世,专业性刊物陆续出版,学术讨论和交流空前热烈,出现了广大理论工作者紧密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深入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好局面。

【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从总体上对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1949—1966年发表论文19篇,其中译文3篇;出版著作8本,其中译著4本;资料性著作7本。1966—1976年,没有发表真正的理论性论文和著作。1977—1987年发表论文330篇,其中译文52篇;出版著作24本(包括论文集17本),其中译著2本;普及性著作6本,资料性著作34本。主要研究内容有:(1)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与不断革命理论的研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清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学术界深入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与不断革命理论,取得了新成果。比较重要的有薛汉伟、辛仲勤、潘国华的《革命与不断革命的研究》。重要的论文有龚育之的《关于“继续革命”的几个问题》,辛仲勤、薛汉伟的《怎样理解“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等。在众多成果中的一些新观点是:①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所说的革命是指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革命,即夺取政权;②马克思的不断革命只限于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③马克思对“不断革命”的终点取慎重态度,认为不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也不是它的初级阶段;④“夺取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的论断,是从社会革命而不是从政治革命角度谈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⑤根据马克思的不断革命理论,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建立和没收地主土地和官僚资本以后,政治革命即告完成。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消灭后,提出和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是错误的。(2)社会主义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研究。包括社会主义本质和基本特征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研究和现阶段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学术界撰写了大批论文和著作,以及调查报告。有代表性著作是林子力的《社会主义经济论》1—2卷、于光远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几个基本问题》的专题论文、宋养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与实践》等。(3)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过去一直沿用列宁和斯大林的定义。这些年国内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于光远在《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建设》和《马克思主义、一般文化与社会主义建设》,段若非在《马克思主义是完整的科学世界观》,都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定义式论述。关于坚持和发展的关系问题,《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坚持马克

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两者统一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之中。学术界对此开展了讨论和研究。唐昌黎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以坚持基本原理为前提》的论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当分为三个层次。周建明在《经济学的变革与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论文中,提出要把研究内容从局限于解释、证明基本原理在今天为什么还能成立,转到从实际出发,解释实际现象,解决实际问题上来。关于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于光远在1983年3月全国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提出的命题,后来又进一步阐述这个命题。

【马恩列斯重要原著研究】根据对18篇马列主义原著的研究论著所做的不完全统计,1949—1976年发表论文534篇,其中翻译的33篇;出版著作196本,其中翻译的39本。1977—1987年发表论文1251篇,其中翻译的49篇;出版著作153本,其中翻译的8本。(1)《资本论》的研究:在马列原著的研究中,以研究《资本论》的论著最多。如郭大力的《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王亚南的《〈资本论〉研究》、王学文的《〈资本论〉研究》、许涤新主编的《〈资本论〉研究》。孟氧和沈志求分别在50年代和80年代编述《〈资本论〉典故注释》。还有马建行、郭继严合写的《〈资本论〉创作史》,章士荣的《〈资本论〉的逻辑》,以及许涤新的《论社会主义的生产、流通和分配——读〈资本论〉笔记》,马家驹的《〈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的《〈资本论〉研究丛书》和北师大《〈资本论〉研究论丛》。1981年成立全国《资本论》研究会,是中国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一部著作作为专门研究对象的研究会。每次学术活动都出论文集。(2)《共产党宣言》的研究:范若愚在50年代写过不少研究《宣言》的书和论文,对这本原著的研究和普及贡献较大。高放在1976年以后发表过不少研究《宣言》的论文,他设计一套有关《共产党宣言》的系列丛书,已出两本:《马克思主义者论〈共产党宣言〉》和《各派社会主义者和西方学者论〈共产党宣言〉》。(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学者开始重视对这部著作的研究。中央编译局发起召开过4次全国专题学术讨论会,发表一些论文和专著,其中杨适著的《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有代表性。我国对马克思这部著作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几十年来西方学者中流行的以“异化”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思潮和国内“十年动乱”的教训进行的。(4)《哲学笔记》研究:对列宁这部著作的研究,发表的著作和论文不少,如黄楠森主编的《〈哲学笔记〉注释》和他撰写的

《〈哲学笔记〉与辩证法》。(5)《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斯大林的这本书对中国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有很大启动作用。几十年来对斯大林的观点的讨论几经起伏。粉碎“四人帮”以后,讨论更为热烈。有的同意或基本同意斯大林的观点,有的则对其某些观点或表述提出批评。例如,孙冶方在《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一文中曾对斯大林的定义提出了批评。再如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的范围和生产资料是不是商品的问题,也有学者提出与斯大林不同的观点。南冰、索真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的价值和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比较早地批评了斯大林关于国营企业间进行分配的生产资料实质上不是商品的观点,认为生产资料在国营企业内部进行分配时,各企业之间还是要把它当作商品来互相对待的。

【马恩列斯生平事业研究】1949—1976年发表文章385篇,出版传记263本。1976年至1987年发表论文910篇,出版传记101本。在翻译方面,1976年以前出版的有《恩格斯传》、《列宁传略》、《斯大林传略》、克鲁普斯卡娅的《列宁回忆录》、梅林的《马克思传》,以及关于马恩列斯的一些回忆录。1976年以后翻译出版的有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著的《马克思传》、《恩格斯传》,科尔纽的《马克思恩格斯传》,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传》和考尔的《恩格斯传》,阿多拉茨基主编的《马克思年表》,尼·拉宾的《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和五卷本的《回忆列宁》,还有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编译的一套4本的《回忆马克思恩格斯》。在中文创作方面,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时顾锦屏等编著了《马克思的伟大的生平》这是国内撰写的第一部马克思传记。此后有肖灼基的《马克思的青年时代》,是我国第一部学术性的马克思青年史,他的《恩格斯传》是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恩格斯学术传记。它用较多篇幅研究了恩格斯的思想理论发展和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关系,并对恩格斯的主要理论著作作了详尽介绍。王兴斌、栾扶桂撰写的《恩格斯的晚年》,探讨了恩格斯晚年的思想和活动,不仅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也把恩格斯生平的前期和后期统一起来,有力地批驳了国际上流行的一些错误思潮。

【毛泽东思想研究】1949—1956年,研究工作以毛泽东著作为主要内容并结合学习中国革命史进行。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撰文阐述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意义和学习研究的重要性。理论界和文化界发表不少学习文章,开始出现全国性的学习热潮。注重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结合,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改造思想。这个时期没有把毛泽东思想作为

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方法上受苏联理论界影响较多。学习范围只限于机关、理论界和文化界，没有普及到工农兵中去。1957—1960年，学习和研究走向深入，发展正常。开始强调毛泽东思想对马列主义的发展；方法上强调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实践；开展一些专题研究；工农兵中涌现出一批学习积极分子，但在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上，仍未看作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1960—1966年5月，林彪主持军委工作，提出一些“左”的论断和口号，把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引向歧途。中宣部曾力图扭转宣传中的简单化、庸俗化现象，并于1961年发过文件，但收效甚微。理论界有人在一些问题上提出过探讨，受到声讨和批判。到“文化大革命”前，这种趋势已不可逆转。“文化大革命”的10年，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大搞个人迷信，毛泽东思想被歪曲，毛泽东本人被神化，形式主义作法到处都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整人工具。众多在研究中坚持正确方向的专家学者遭迫害。1976年10月以后，邓小平提出要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把实事求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基本点，并于1978年5月，开始了历时近一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为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作了必要的准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一届六中全会以来，毛泽东思想研究进入新时期。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广泛吸取了党内外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成果，总结了历史经验，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的评价，推动和指导了研究工作。这个时期，突破了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禁锢，不仅注重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结合，而且把毛泽东思想视为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实事求是地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加强了毛泽东著作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著作以及党的文献的出版工作。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专门机构和群众团体相继成立，有了一支专门从事毛泽东思想研究的理论队伍；四川省还出版了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杂志；研究毛泽东思想的论著颇多，粗略统计，到1987年有专著200余本，论文4000余篇。

【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研究】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对象，学术界有以下几种观点：（1）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研究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性质、条件和一般目的的科学。（2）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这个定义包含了上述性质、条件和目的。（3）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研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产生和发展规律的科学，主张综合地、总体地研究和回答实践问题。（4）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研究改变资本主义、帝

国主义世界和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世界一般规律的科学。持这种观点的人强调科学社会主义研究不应拘泥于引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条文，而应从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中研究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问题。倾向性的意见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一门综合性的科学，从总体上研究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对外关系等各方面的内在联系和运动规律。讨论科学社会主义对象代表性的著作有：范若愚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对象及其基本内容》、解芝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对象是什么？》、李生林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廖建新的《科学社会主义是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等。

【工人阶级执政党建设研究】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成了在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研究也随之开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执政党建设的研究进入了更广泛、更深入的阶段，并逐步形成了全党抓党建的大气候。党建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下列问题：（1）执政党如何发挥领导作用，如何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2）党同政府和其他组织的关系、执政党怎样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3）在执政条件下，共产党怎样才能继续地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共产党员怎样才能继续保持和发挥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作用；（4）执政党怎样发扬党内民主，怎样实行正确的集中，健全和完善民主集中制；（5）怎样发挥党的领袖的作用，建立领袖同党、同群众的正常关系；（6）怎样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健全党内监督体制，加强党的团结统一，怎样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等等。全国各级党校都成立了党建教研室，全国成立了党建学会，有的省也有自己的党建学会。全国性刊物有《党建研究》和《党建》。党史刊物、科学社会主义刊物也发表研究党建的文章。十年来是中国党建研究成果最丰富的时期。主要成果：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的《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张蔚平、张列军的《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概论》，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编的《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史》，范平主编的《新时期党的建设教程》，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学习纲要》等。党建方面最重要的理论成果，要算是冯文彬、高迪、王茂林、王瑞璞四人主编的9卷本的《中国共产党建设全书》。

【一国两制战略构想研究】理论界对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战略构想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1）“一国两制”的涵义。一种意见认为，一个国家实行两种社会制度，古今中外皆有。另一种意见认为，专指社会主义国家某些地区保存资本主义，主体是社会主义。（2）“一国两制”的理论依据。一种意见认为，

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新发展,没有理论依据。第二种意见认为,理论依据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第三种意见认为,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第四种意见认为,总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是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是和平共处思想。(3)“一国两制”的实践依据。一种意见认为,抗日战争时期的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就是“一国两制”。第二种意见认为,在世界历史上也屡见不鲜。美国独立战争后,北方的雇佣劳动制和南方的奴隶制就是“一国两制”。第三种意见认为,中国史上北魏政权是“一国两制”的典型。第四种意见认为,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理论、新实践。(4)关于“一国两制”的理论意义。一种意见认为是对马列主义国家与法的理论的发展;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是统一战线理论的丰富和发展。(5)“一国两制”是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种意见认为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第二种意见认为是中国的特点,但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第三种意见认为,从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来说,不算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从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来说可以算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方面主要研究成果有:钱俊瑞的《从香港问题圆满解决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英明构想》,周毅之、施汉荣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理论根据》,管彦诚、张敏惠的《“一国两制”是对马列主义国家与法的理论的重大发展》,陈鹏生的《“一国两制”的历史借鉴》,赵春义主编的《一国两制概论》以及《瞭望》周刊海外版编辑部编的《“一国两制”与祖国统一》等。

【新时期统一战线研究】 理论界对统一战线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的认识是一致的,但对于它的学科归属问题有分歧。有的认为统一战线问题是一门边缘学科;有的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共党史的组成部分;有的则认为它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任务、目的和作用的認識是一致的。对统一战线内部“又团结又斗争”的原则有争论。有的认为这一原则是针对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提出的,现在不适用了。有的认为“又团结又斗争”仍然可以作为一个基本原则,但应完整地现实地考虑。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不能不在统一战线内部有反映。批评与自我批评、说服教育应当包括在“斗争”之中。有的认为,这一原则在大陆不宜再提,但在国际统一战线,在对港、澳、台问题上仍然适用。主要研究成果有:陈紫云的《论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光明日报》1984年4月2日)、陈安东的《谈谈统一战线

的新发展》(《人民日报》海外版,1986年2月20日)、蒋木哲的《新时期统一战线的基本特征》、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研究室编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统战理论探讨》等。

【中国科学社会主义研究】 50年代,党校系统和部分高等学校开设具有科学社会主义内容的“马列主义基础”课,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教材。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设立马列主义基础专业,招本科和研究生,主攻课程仍是苏共党史。1957年独立成系,主攻课程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1957年高放著文建议把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独立学科进行研究和讲授。理论工作者以毛泽东提出的“五论”(阶级论、革命论、国家论、政党论、战略策略论)为基本线索发表不少论著和文章,论述中国共产党如何运用这些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问题。理论界编辑出版一系列马恩列斯论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资料,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论无产阶级革命,论无产阶级专政,论无产阶级政党,论民族解放运动,《列宁论国际形势和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列宁斯大林论帝国主义》、《毛泽东同志关于战略策略言论摘录》等,还出版了李维汉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艾思奇的《阶级和国家》、吴江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等著作和许多论文。“文化大革命”期间,停止了一切真正的科学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及其各个组成部分都被歪曲,只宣传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科学社会主义开始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进行研究,在许多方面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为适应教学和科研的需要,党校和高校成立专门的教研室,有的大学成立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1979年北京市率先成立科学社会主义学会,1983年成立全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到目前为止,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自己的科学社会主义学会。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刊物相继出版,如全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的《科学社会主义》、北京市科学社会主义学会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华中师大的《社会主义研究》、辽宁省的《精神文明研究》等。光明日报创办了《科学社会主义专刊》。全国各地编写了上百本科学社会主义教材。如范若愚、江流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概论》、高原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人大科社教研室集体编写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山东大学赵明义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赵曜、吴作丞、沈宝祥主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论》赵曜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论纲》等。此外,中国人民大学还编辑和出版了《马

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科学社会主义》四卷本资料。高等学校普遍开设科学社会主义课,教材颇多,一般都叫《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或《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无产阶级专政研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理论界对无产阶级专政问题讨论得比较热烈,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1)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问题,共有三种意见:①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就是暴力统治;②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是无产阶级通过本阶级的代表在国家政权中的比例优势和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运用国家政权对大多数人实行民主,对少数敌人实行专政,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顺利进行;③认为应全面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首先,革命暴力是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之一;其次,必须理解无产阶级的实质在于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在于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组织,特别是工作重点转移到建设上来以后,更应注意这一方面。(2)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问题。共同的意见认为过渡时期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对于社会主义时期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普遍认为,社会主义时期仍然需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个别意见认为,以不提无产阶级专政为妥。后一种意见显然是错误的。(3)关于社会主义国家职能问题。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职能之一。学术界对阶级斗争的讨论比较活跃。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管理职能的含义、特点及发展规律和活动范围等也作了探讨,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的这种管理职能越来越重要。(4)关于人民民主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区别和联系。普遍认为,人民民主专政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专政,既具有无产阶级专政的一般属性,又有中国的特点,更符合中国国情。在政权的阶级结构上,在政治制度上,在提法上都有突出的特点。主要研究成果有:廖盖隆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和人民内部矛盾》,《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与阶级斗争问题》,田穗生的《国家的两种职能及其关系》,邓才云的《简论新旧国家管理职能的区别》,吴少荣、徐启华的《我国理论界关于国家学说的讨论》,冯干文的《论无产阶级国家经济职能的发展》,高放的《社会主义国家政体探讨》,李准的《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章士荣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史》,洪韵珊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历史和现实》,向美清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考察》,王子琳主编的《国家学说概论》等。

【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和发展阶段研究】中共

十二大召开以前,理论界一直把公有制、按劳分配和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等3个方面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中共十二大提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包括剥削制度的消灭和生产资料公有制、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按劳分配、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等6个方面。1990年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学习纲要》中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共有8条。和中共十二大的6条特征比较,有两点突破:一是把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结合在一起,使每一条既是与资本主义或其他社会形态相比较而呈现出的特征,又是在实践中应当坚持的基本原则。这种概括比一般谈特征更有操作性。二是增加了共产党的领导、民族关系、外事关系三条。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首次指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来在中共十二大报告和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两个文件中进一步重申了这个观点。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报告中全面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涵义、依据、指导方针和基本路线,标志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最后形成。学术界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对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发表了许多专著和文章。主要有:陈基明等主编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王琢、廖曙辉的《过渡社会主义论》,高骞主编的《历史的抉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研究》,吴国光主编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纲》,蔡仲德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和李洪林的《四种主义在中国》等。

【社会主义革命理论问题研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术界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围绕下面几个问题展开的。(1)关于暴力革命与革命和平发展问题。主要有三种观点:①暴力革命是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②革命必须夺取政权是普遍规律,而夺取政权的方式可视各国国情而定,或是暴力的,或是和平的,或是以暴力为后盾和平地夺取政权,因为夺取政权方式并不是规律,只是规律的某种具体表现形式;③多数人在承认暴力革命的同时不否认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无产阶级必须准备革命的两手。研究这个问题的作品,除所有科学社会主义教科书中都有“无产阶级革命”一章外,主要有:张式谷的《论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变迁》、蒋照义的《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马勾的《马克思主义历来主张用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

手》等。(2) 关于落后国家首先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胜利论”和“一国胜利论”问题。有人认为“同时胜利论”是马恩一贯主张；另一部分则不同意这种意见。研究这个问题的作品主要有周隆寅的《关于经济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基础》，许英鹏、陈钟的《简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同时胜利论”到“一国胜利论”的思想发展》等。(3) 关于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的研究。

【社会主义民主研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理论界对民主问题的讨论主要有：(1) 民主概念的涵义。一种意见认为，民主首先是指国家制度，是多数人的统治；另一种意见认为，民主是人民在一定生产方式下取得的自由权利，它部分地属于政治范畴，但总体上属于社会范畴；第三种意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内容应分为两类，即国家形态的民主和非国家形态的民主；第四种意见认为，作为上层建筑的民主随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因而分为三大类型，即无产阶级的原始民主、阶级社会的民主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民主。(2) 民主是目的还是手段？一种意见认为，民主既是目的又是手段；第二种意见认为，民主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第三种意见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是手段。(3)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界普遍认为，要从国情出发，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不断推进民主进程；民主政治建设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4) 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关系。普遍认为，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看待资产阶级民主的作用和局限。资产阶级民主是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也与无产阶级争取民主的斗争有关系。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某些具体形式可以批判地继承，但是必须批判和反对旨在用资产阶级民主取代社会主义民主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主要研究成果有下列专著和论文：施治生、沈永兴编著的《民主的历史演变》、徐鸿武主编的《社会主义民主概论》、孙慕良的《马列主义民主观的若干问题》、卢之超的《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方针》、贾春峰的《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在健康发展》、王刚义、李敏的《当代民主政治分析》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论述，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界的讨论主要涉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涵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等三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研究成果主要有：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理论组编的《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南》、钱俊瑞主编的《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

表的重要论文有范若愚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红旗》1983年第4期）、江流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发展》（《中州学刊》1983年第2期）、邓友群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献》，红旗出版社）、廖道隆的《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汇报》1983年3月12日）、薛暮桥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红旗》1982年第19期）等。中共十三大以后，高等学校普遍开设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课，教材颇多，书名一般都叫《中国社会主义建设》。

【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研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除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自称信奉社会主义的一切思潮、派别、运动、政党和国家的研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兴起的一个新学科。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等部分高等学校率先成立专业教研室，对当代国外社会主义进行研究，并设为正式课程。1986年4月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在北京成立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会并举行首次学术讨论会。主要讨论了研究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的意义、当代国外社会主义学科名称的界定和研究对象的表述，以及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的分类和学科体系等三个问题。对当代国外社会主义多样性的研究，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多样性的表现，如派别和组织的多样性、指导思想多样性、社会模式的多样性、阶级内容的多样性以及成效的多样性等。二是造成多样性的原因，主要是各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心理上的区别，决定社会主义运动的不同内容和不同的形式。同时，国际环境的演变、各民族传统的差异也是形成社会主义多样性的原因。研究国外社会主义的主要成果有：求实出版编辑的《亚非拉各种社会主义》，高放主编的《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概论》，中央党校的《当代国外社会主义》，赵明义主编的《当代国外社会主义问题纲要》，檀玉玺、董名程、艾景学主编的《当代国外社会主义教程》。资料书有中央党校的《国外社会主义研究资料丛书》和山东大学的《当代国外社会主义资料选编》。有关期刊有中联部编的《当代世界政党》，山东大学的《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等。

【中国哲学研究】新中国成立40多年来，中国的哲学研究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哲学的各个主要分支学科，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国哲学史、外国哲学史、现代外国哲学、伦理学、美学、逻辑学、自然辩证法等等，都日益完善地建立起来。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7年“反右运动”前夕，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全国范围

内的传播,人们开始注重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批判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研究新中国建设中提出的重大哲学问题。对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性质、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性质、社会发展的动力、真理的客观性和阶级性、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哲学遗产的继承、美的本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在学术研究中初步形成了自由探讨、相互商榷的学风。从1957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哲学研究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中国哲学史、伦理学、美学和逻辑学等方面,研究工作都有所进展,发表了大批有相当质量的学术论文和著作,获得了丰硕成果。但由于受“左”的错误的影响,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宣扬主观唯心主义、鼓吹唯意志论、无限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错误观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哲学研究机构得到了恢复、健全或加强;各专业的学术组织陆续建立起来;哲学各分支学科残缺不全的状况得到了改善;国际国内的学术交流活动空前活跃;许多学科都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运用了一些新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哲学各分支学科都取得了大量成果,研究质量普遍有所提高。

【辩证唯物主义研究】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辩证唯物主义研究先后开展过关于矛盾同一性问题的讨论,关于什么是真理、真理有无阶级性,相对真理中是否包含错误的讨论,关于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关系的讨论,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讨论,关于“合二而一和一分为二”的讨论,等等。这一时期发表了毛泽东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李达的《唯物辩证法大纲》、《〈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较有影响的著作。学术界在宣传、普及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1978年5月开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有力地推动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日趋繁荣,主要表现在:(1)认真总结了建国以来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工作的经验教训,对辩证唯物主义的体系结构、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实践的要素和结构、真理和错误的关系、系统理论与矛盾学说的关系、特别是对主体和客体及其关系、主体和主体性等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2)在概括自然科学新成果、回答新技术革命的挑战等方面,开始出现一些新的学术成果。(3)在批判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诋毁和攻击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4)发表了大量有一定质量的学术论文,出版了若干有一定水平的专著,翻译介绍了一批国外学者的有关文章和著作。

【历史唯物主义研究】 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理论界主要开展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性质、关于社会存在、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动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问题的研究和讨论。这些讨论对于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理论研究、回答实践中的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其中有些问题的讨论受到“左”的思潮的干扰,有的探讨因政治上的原因而中断。“文化大革命”期间,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处于停滞状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走上了正轨,并日益繁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气勃勃的局面,学术活动十分活跃。国家一级和各省、市及高等院校的研究机构相继恢复,增设了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室(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等学术团体纷纷成立。出版了一些学术专著和发表了大批学术论文,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景天魁的《打开社会奥秘的钥匙》,李清昆、王秀芳的《普列汉诺夫与唯物史观》,王锐生、景天魁的《论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叶汝贤的《唯物史观发展史》等。研究工作主要成绩:(1)应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方法研究并回答当代实践提出的一系列现实问题。研究了现代技术革命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及其发展的阶段和规律,发展商品经济同所有制改革的关系,国家经济职能的发展趋势,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关系等问题,并结合这些问题的研究开展了对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的研究和批判。(2)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理论的研究。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形态等一系列基本范畴展开了更加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不少具有启发意义的新见解。对人的本质、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概念等问题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外国哲学研究】 50年代,中国哲学界侧重于研究苏联哲学,对现代西方哲学基本上持否定态度。60年代,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成立了现代外国哲学研究组,开展了对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实用主义、人格主义、存在主义等流派的研究,翻译出版了一些现代外国哲学著作,发表了一些研究论文,个别大学还开始设立现代外国哲学课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并有了重大进展。(1)明确了研究现代外国哲学的方针。1979年11月召开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现代外国哲学讨论会,并成立了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会上明

确了研究现代外国哲学的方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力求全面地、正确地、如实地了解研究对象，然后加以认真的分析和批判。(2) 建立了许多科研教学机构。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把原来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组扩大为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北京大学建立了外国哲学研究所。武汉大学建立了美国哲学研究室和法国哲学研究室。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也建立了现代外国哲学教研室。(3) 研究队伍迅速扩大。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从事这方面研究的科研教学工作者有 300 多人。国内许多高等院校招收了大批硕士研究生和少数博士研究生，还有派到国外攻读这个专业的研究生。(4) 出版了一系列教材和研究论著。教材有：刘放桐等的《现代西方哲学》，夏基松的《当代西方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教程》，葛力主编的《现代外国哲学》等。论著有：杜任之主编的《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贺麟的《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徐崇温等人的《萨特及其存在主义》等。此外，还创办了一些学术刊物，如《外国哲学资料》、《美国哲学资料》、《现代外国哲学》集刊等。(5) 加强了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的研究。对现代西方各派哲学的研究范围扩大，已在研究的现代哲学流派有：唯意志主义和生命哲学，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新实在论和批判实在论，实用主义、分析哲学、操作主义、自然主义、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等 20 余种。

【伦理学研究】 50 年代，伦理学在中国曾被当作伪科学取消。1960 年经教育部批准，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先后筹建了伦理学教研室（组），初步开展了一些科学研究或教学工作，但后来这方面的工作一直处于停顿状态。“文化大革命”期间，刚刚起步的伦理学研究倍受摧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伦理学研究出现了空前繁盛的局。继 1978 年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恢复或重新成立伦理学教研室之后，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院校也组建了伦理学教研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重新成立了伦理学教研室。1980 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伦理学学术讨论会，成立了全国伦理学学会，广泛开展了学术讨论和科研教学活动。十余年来，出版了一批伦理学专著和教材，发表了一批论文。影响较大的有：罗国杰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罗国杰等编著的《伦理学教程》、王润生的《中国伦理生活大趋势》、邱仁宗著的《生命伦理学》、王少哲等合著的《教师职业道德》、杨德荣主编的《科学家与科学道德》等。开展的研究有：(1) 伦理学基本理论研究，深入探讨了伦理学的基本问题、道德结构问题、道德的相对独立性与特殊性问题、道德的根源问题、人性与

人的本质和人的价值问题、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问题、道德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等。(2) 社会生活现实伦理道德研究。围绕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过程中如何进行道德建设的问题、职业道德建设问题、社会公德教育问题、性道德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对科技发展道德进步的关系问题，以及非自然生殖技术（如试管婴儿）、人体器官移植、控制生育、安乐死等比较难以解决的道德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其中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已经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3) 伦理学领域的某些突破性研究。这一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为“道德利益论”、“道德层次论”、“道德主体论”的提出和讨论。

【美学研究】 50 年代中期，以批评朱光潜在建国前的美学思想为出发点，展开了美学大讨论。据不完全统计，参加讨论的近百人，发表文章 300 篇左右，编成《美学问题讨论集》6 集。这次讨论以美的本质为中心，涉及到美学对象、美感和自然美等问题。形成 4 种主要观点：(1) 主观美论。认为美是主观的、美是观念。主要代表人物是吕荧和高尔太。(2) 客观美论。认为美是客观的，“美在物本身”。主要代表人物是蔡仪。(3) 主客观统一美论。认为美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主要代表人物是朱光潜。(4) 客观性与社会性统一美论。认为美是物的一种客观社会属性，人类社会的产物。主要代表人物是李泽厚。这些不同观点相互争辩，同时又在不同程度上相互吸取，使美学研究逐步深入。60 年代，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先后建立了美学教研室。学术界也翻译、介绍了一批苏联、西方的美学论著。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代表了当时中国对西方美学理论研究的水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美学研究进入了新的繁荣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美学研究有两个特点：(1) 美学研究的视野和领域大大扩展，以往的老话题、鲜为人知的新领域都有人涉足。出版和发表了数以千计的论文、论著、译著和普及读物。影响较大的有：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滕守光的《审美心理描述》、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等。(2) 美学研究在深度上有所突破。主要表现在：对美学的哲学前提进行了重新探讨和再认识；更加注重主体一人以及其审美结构的研究，审美心理学日益受到重视；研究工作更为具体化、精细化，部类美学研究富于生气；美学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斐然，前景乐观。这一时期美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理论问题深入不下去，讨论题目过于分散，重要的美学著作尚不多见。

【逻辑学研究】 1952 年北京大学哲学系设立了逻辑专业。1955 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成立了逻辑

辑研究室。1956年制订的国家12年远景规划中,包括逻辑的发展规划。《哲学研究》编辑部先后编辑出版了《逻辑问题讨论集》、《逻辑问题讨论续集》和《逻辑问题讨论三集》。这一时期研究和讨论的问题主要有:形式逻辑的客观基础问题,形式逻辑的对象和作用问题,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之间的关系问题,推理的真实性和正确性的关系问题,修正和发展形式逻辑问题,辩证逻辑的对象问题。这些讨论使逻辑工作者对逻辑科学的性质、对象、作用等许多问题有了比较统一的认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逻辑专业人员得到迅速扩充。形成了近千人的研究队伍,全国有十多个单位招收逻辑硕士研究生,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还培养了逻辑博士研究生。自1979年中国逻辑学会成立后,各种带有学科特点、地区特点、系统特点的逻辑学会相继成立,学术气氛活跃。在大专院校、成人高等教育、甚至中等专业学校都相应地开设了逻辑课。出版了相当数量的逻辑教材以及部分逻辑学专著、译著,发表了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逻辑论文。1978年5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逻辑讨论会,以后又相继在长沙、大连、西安等地多次召开了全国性的逻辑学术会议,这些会议就中国逻辑科学如何改革、如何发展,如何为“四化”建设服务等问题和一些新的学术观点展开了热烈的争论,有力地促进了这门科学的发展。逻辑学的研究领域也不断扩大,从形式逻辑开始,很快扩展到数理逻辑。辩证逻辑、应用逻辑、中外逻辑史等各领域,在形式逻辑方面,主要围绕充足理由律是不是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虚概念问题,特别是“形式逻辑现代化”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深化了形式逻辑的研究。在数理逻辑方面,这一时期进行的主要工作是介绍国外的研究成果,普及这门学科的知识,先后出版了王宪钧的《数理逻辑引论》,胡世华、陆钟万的《数理逻辑基础》,莫绍揆的《数理逻辑教程》,周礼全的《模态逻辑引论》、林邦瑾的《制约逻辑》等著作。在辩证逻辑方面,主要围绕辩证逻辑的对象、规律,辩证思维的形式,辩证逻辑的范畴,辩证逻辑的形式化等问题进行了积极的、开拓性的讨论和研究。这些研究的深化及其成果,将决定着辩证逻辑能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而存在。此外,在中西逻辑史、语言逻辑、归纳逻辑、应用逻辑等分支学科上,也取得许多研究成果。

【自然辩证法研究】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夕。自然辩证法研究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探讨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总结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出版了专门杂志《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并大量翻译出版了国外有关的研究成果,如《巴

甫洛夫学说的哲学基础》、《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等学术著作,开展了主要是与苏联的对外学术交流。“文化大革命”时期。自然辩证法研究停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进入了第三阶段。十余年来,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工作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形势。1981年冬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学术界先后出版了《自然辩证法讲义》、《自然辩证法原理》、《自然辩证法教程》等专著、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百种以上,发行了《自然辩证法通讯》、《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科学与哲学》、《自然信息》、《自然辩证法研究》等多种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千篇以上。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内容,也向着辩证自然观、自然科学观、科学方法论、科学哲学、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等方向全面展开,澄清了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一些混乱,加强了某些薄弱环节的研究,深化了某些方面的探讨,使自然辩证法各领域的研究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中国宗教学研究】中国的宗教学研究主要机构是1964年成立的世界宗教研究所,1979年成立了中国宗教学学会,此后,在全国各地开始成立宗教研究机构,主要活动有:(1)确定和实施了全国重点宗教研究项目,如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徐如雷、江文汉、陈增辉、顾长声编写《中国基督教史》、卿希泰、王明主编《中国道教史》等。(2)加强宗教研究的学术交流,较多地开展了宗教学分科和专题学术讨论会,如对佛教、伊斯兰教、无神论等都多次开过学术讨论会。(3)创办专门发表宗教研究论文和资料的刊物,如世界宗教研究所主办的《世界宗教研究》、《世界宗教资料》,四川大学创办的《宗教学研究》,还有一些内部刊物;(4)各地发挥自己的优势,宗教研究正在形成各有侧重和特色的局面。如世界宗教研究所从事综合研究,上海社科院着重研究社会主义时期宗教,南京大学侧重研究基督教,四川大学着重研究道教等。(5)各地学者开展协作,并已取得成果,如1981年出版的《宗教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6)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和党的宗教政策的学习和研究。(7)加强培养宗教学专业人才,1978年以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每年都招收宗教学方面的硕士研究生,从1983年以来又招收博士研究生。1982年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与北京大学哲学系共同创办宗教学专业,招收本科生。

【宗教学原理和宗教政策研究】中国学术界重视基本理论研究,认为对宗教的批判应当转化为对不合理的旧社会进行变革;宗教批判的目的和意义就是为了消除宗教对于人民精神上的麻醉,使人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人民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对马

克思的名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理解，学术界也有广泛的讨论。对“宗教五性论”，即宗教的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长期性，关于“五性”是否存在及如何评价“宗教五性”的作用及如何认识“宗教五性”与宗教本质的关系，学术界也有多种认识。对宗教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学术界进行了研究。对宗教政策的研究的主要认识有：（1）充分认识宗教在中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新变化、新特点，认识宗教的长期性和复杂性；（2）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上的基本政策；（3）使全体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联合起来，团结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我们处理一切宗教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4）加强对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调查和研究，以提高抵制“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潮的能力；（5）加强党的领导，是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做好宗教工作的根本保证。

【中国社会学研究】 1979年3月，成立了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学会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研究大量的长远的社会生活、社会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它并没有也不会代替关于社会现象具体研究的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人员做了大量的工作：（1）普遍建立地方性的研究机构和专业协会。（2）建立教学机构，加速培养人才，如1980年3月，复旦大学分校（后改为上海大学文学院）率先设立社会学系，并招收本科生。同年年底，天津南开大学开办社会学专修班，1982年建立了社会学系，并开始培养首批社会学研究生。（3）编写教材，出版书刊。仅《社会学概论》就有4种不同的版本。在杂志方面，有中国社会学会和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主办的《社会学通讯》，有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办的《社会》，有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的内部刊物《社会研究》等。社会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一是研究对象问题，有综合性研究、研究社会问题、研究社会关系三种观点。二是学科体系问题，费孝通认为，社会学必须在中国自己的国土上成长起来，必须是反映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华民族特点的中国社会的社会学。应批判地继承所有过去社会学的成果和批判地吸收西方社会学的成果，并立足于中国社会实际为主，通过实践和考验逐步发展中国自己的社会学。三是具体研究的社会问题，如江苏小城镇研究、婚姻家庭问题、青少年与老年研究、中国人口研究、生活方式问题研究等。

【中国科学学研究】 中国科学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当时主要是传播科学学的有关知识。50年代至60年代，开展了对科学和科学政策，科学的

性质和特点、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的理论研究，并引进了国外有关的研究文献。1979年，在北京举行了全国第一次科学学术讨论会，并建立了科学学全国联络组。1982年成立了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全国各省市也成立了相应的学术团体，有关刊物已达15家。科学学的主要分支学科是科学体系学、科学社会学、科学政策学、科学管理学和科学经济学等。跨分支研究的重要专题有：科学学的对象和结构，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科学的体系结构，社会的科学能力，新技术革命及其对策，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科研合同制、科研责任制和技术商品化，科技人才的群体结构和智力开发，科学计量研究等。中国科学学研究活动特点是：（1）引进与独创相结合；（2）理论科学学研究与应用科学学研究相结合；（3）提高与普及相结合；（4）科研工作者、科学组织工作者和科学领导工作者相结合；（5）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和科学学的专业研究相结合。科学学研究的综合性著作有田夫、王兴成主编的《科学学教程》，夏禹龙、刘吉、冯立竣等编著的《科学学基础》，何钟秀、关西普主编的《科学学纲要》等。学术著作有：赵红州的《科学能力学引论》，梁早春的《科技管理基础》，陈敬燮、郑慕奇主编的《工业技术管理教程》等。

【中国未来学研究】 未来学研究包括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两大部分。未来学于70年代中期传入中国。1979年成立中国未来研究会，1980年中国社科院招考未来学研究人员。同年未来研究会创办《未来与发展》杂志。80年代以来，未来学的发展进入广泛应用性研究阶段。中国未来学形成了自己的特点：（1）强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作为指导思想；（2）注意发挥中国传统未来研究和预测的特长，同时又把传统的调查研究、专家咨询、规划计划工作与未来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相结合。（3）强调从国情出发，为管理工作和决策服务。（4）注意在前人和国外成果基础上创新。（5）未来学的应用研究，强调实事求是，反对西方悲观派和盲目乐观派。在未来学的理论研究方面，主要探讨三个问题：（1）在研究对象方面不同意把抽象的“未来”作为研究对象，只能把某个事物的未来，某个领域的未来作为研究对象。（2）在完善学科体系方面，认为应包括人类预测活动发展史、预测科学发展史、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方法论研究。（3）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指导中国未来学研究的指导思想，而且应当成为预测论的基础理论，强调三个基本规律对预测活动的指导功能。（4）在方法论和技术方面的研究上也取得可喜的成就。中国未来学的应

用研究,已在经济、社会、科学、技术、军事、教育、卫生、人口、城市、交通、能源、环境等领域逐渐展开。研究工作同国家、地区和部门的规划和计划工作相结合,在各级决策中发挥咨询、参谋和助手作用。中国未来学研究的著作主要有:秦麟征的《预测科学》,钱学礼的《怎样科学的预见未来》宋健、于景之等的《关于我国人口发展的定量分析》,郑聚龙的《灰色系统理论》,中国社科院情报研究所编译的《未来预测学译文集》等。

【中国情报学研究】 中国的情报学研究活动大体与科技情报事业的发展同步。50年代制订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和《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提出,要迅速、系统地开展专门的科技情报工作;把它视为发展中国科学技术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1956年10月15日中国科学院科学情报研究所正式宣告成立;1958年更名为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成为全国科学情报事业的中心,接受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双重领导。1957年12月,该所创办了《科学情报工作》杂志(后更名为《科技情报工作》)。为了解决情报资料的分类整理问题,有分析和有批判地引进了国际十进分类法,随后开展了分类法与主题法的讨论,对分类法与主题法进行了比较研究,探明了在中国切实可行的检索方法。50年代末期,配合当时翻译国外文摘的实践,开展了文摘问题的讨论。经过几年的实践,提出了建立中国自己的性质各异、功能互补的情报刊物体系的思想,形成了检索、译报、研究三大类的情报刊物体系。袁翰青、曹昌等人组织编写了中国第一本情报学教材《科技情报工作讲义》。在“文化大革命”中,情报学研究受到摧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情报学研究逐步在更大的范围内兴起。1978年8月,中国科技情报学会正式成立。此后,全国各地(除台湾省外)陆续成立了地方科技情报学会。1979年,《科技情报工作》复刊。同年12月全国科技情报学会召开第一次年会,中断多年的学术讨论又重新开展起来。1980年,《情报科学》和《情报学刊》这两家情报专业杂志先后在中国东北和西南创刊,大大促进了情报学研究的迅速发展。1982年中国科技情报学会创办了自己的学术刊物《情报学报》。为了适应科技情报工作迅速恢复和发展的需要,情报学教育在中国范围内开展起来。不少大学开设情报专业课,一些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开始招收情报专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编写情报科学教材。武汉大学建立图书情报学院。国家科委在武汉大学着手筹建全国科技情报人员培训中心。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美国文化委员会的支持和帮

助下,于1985年开始举办学制一年的情报研究班。情报学会成立以后,召开了近40次学术会议,发表研究论文2000多篇,学术研究的内容逐步广泛和深化。情报学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人才培养、情报的定量分析、情报经济学、情报需求研究、情报政策研究、情报技术的开发利用等方面都显示了中国情报学研究开始具有了一定的水平。

【中国民族研究】 1950年,国家规定中央民族学院及其分院均应设立民族研究室。不久,中国科学院先后成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和民族研究所,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少数民族调查,即民族识别、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通过调查,反映出建国初期民族研究工作的概貌和特点,搜集丰富的资料,为以后的民族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文化大革命”中,民族研究受到摧残,直至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以恢复和发展。新成立许多民族研究机构,形成了全国性的科研机构网络,同时群众性的学术团体也纷纷成立并开展活动,学术空气空前活跃,标志着中国的民族研究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民族问题的研究主要有民族问题理论和民族政策的研究、民族学研究、民族历史研究,民族语言研究、世界民族研究。中国民族研究工作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理论联系实际,着重实地调查,注意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各研究机构紧密组合,民族研究的学科不断拓宽。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除发表大量论文、专著和工具书外,国家民委主持和组织全国民族工作者和民族研究工作者编写的多达数百册数千万字的民族五大丛书正在陆续出版。由包尔汉担任编委会主任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已出版。

【中国民族理论研究】 建国后,民族理论研究主要是研究马列主义关于民族理论的著作,系统宣传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和政策。1956年制订12年科研规划,把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研究列为一个学科,提出研究中心和重要项目。1963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创立民族理论研究室。各民族院校也有自己的研究机构。“文化大革命”期间,研究机构被拆散,人员下放,资料被销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族理论研究工作得以恢复和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理论室恢复工作,人员有所增加。中央、省、自治区有关民族工作的领导机关也建立了民族理论研究机构。1979年4月,在全国民族研究规划会上成立了中国民族理论研究会,接着全国各地也成立了从事民族理论研究的群众学术团体。学术活动活跃,成果多。民族理论研究的主要问题:(1)关于民族概念的涵义

和民族的形成时间。对民族概念,一种意见根据斯大林观点认为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产物。另一种意见认为,斯大林讲的是资产阶级民族,不是指各种民族,不能硬套。对民族形成时间问题,有几种观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原始社会末期私有制出现时、原始社会野蛮时期的中期或高级阶段、原始社会蒙昧时期的高级阶段。(2)正确对待民族特点问题。在研究过程中,有的受“左”的影响,忽视民族特点的长期性,错误地把社会主义条件下各民族间共同性日益增多的现象与“民族融合”联系起来。甚至有的地方把不同意上述意见,注意民族特点批评为“落后”。也有人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分析社会主义条件下各民族间共同性增多,但指出这和民族融合有根本不同。(3)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学术界普遍认为民族区域自治是马列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是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在实践中的体现。(4)关于民族实质。几年来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涉及到什么是民族问题,提不提民族实质问题、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实质等许多问题。对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实质有三种意见:①认为实质是消灭经济、文化事实上的不平等;②认为社会主义时期不存在统一的民族问题实质,只能按阶段、国家的不同而定;③认为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统一的民族问题实质,至于是什么,又有不同看法。

【中国民族学研究】中国民族学研究任务是对民族的族体作全面考察,研究民族的起源、发展和消亡的过程,研究各族体内部社会基本矛盾。其目的是,为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服务,为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为党的民族工作服务,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1952年成立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1958年中国科学院建立民族研究所,许多民族聚居地区也相继建立了民族学院和民族研究所。“文化大革命”期间,研究机关被解散,民族学研究工作陷于停顿。1979—1982年间,被撤销的研究机构大都恢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成立了民族学研究室,民族学研究开始走上正轨。1980年,中国民族学会成立,学会创办了《民族学研究》、《民族学通讯》两个刊物。《中国少数民族》作为中国民族志,全面反映了55个少数民族各方面的情况,现已被译成英、法、西、德、日等文字。围绕民族学研究而进行的最主要的工作是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调查。这项工作从50年代初开始,大量的调查报告和宝贵的历史资料,为进行民族识别,为党和国家制定少数民族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在民族学研究中,对少数民族社会形态的研究占有突出的地位。出版的专著有林耀华的《原始社会史》,秋浦的《鄂伦春社会发展》,吕光天的

《北方民族的原始社会形态研究》,黄淑博等的《中国原始社会史话》,严汝娴的《永宁纳西族母系制》等。

【少数民族社会性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少数民族中大约3000多万人处于封建社会,约400万人处于封建农奴制,约100万人处于奴隶制度,还有70万人保存着原始公社制或原始公社制的残余,中国民族学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为依据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确认各少数民族所处社会阶段,为党和国家分别不同情况决定各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针、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如对建国前保存原始公社制度的民族采取了直接过渡的方针,而对奴隶制、农奴制地区采取“和平协商”的方式进行改革,即在消灭奴隶主和封建主所有制的前提下,对上层采取赎买政策。这些政策在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起到重要作用。

【中国世界民族研究】世界民族研究的方针和任务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研究和介绍世界各国的民族情况和民族问题,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中国的民族工作服务,为增强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往来服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对世界民族的研究迅速发展。1979年成立了中国世界民族研究学会,并两次举行全国性学术讨论会,出版了一批专著和论文集。中国世界民族研究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1)民族情况。各民族构成,人口、分布、种族类型、语言文学、宗教信仰、社会形态、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2)民族问题。各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关系,民族矛盾、民族斗争,某些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理论、原则和政策,第三世界人民的反霸斗争等。(3)民族理论。对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国家民族的形成、发展、分化、同化、繁荣和融合的过程及发展规律的探索。(4)对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及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作用的研究。(5)对各国民族学者的理论和学说的研究。

【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政治学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1980年成立中国政治学会。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政治学研究所,各省的社会科学院也先后成立政治学(政法)研究所,或政治学研究室。高等学校恢复了政治学系或专业。中国政治学会于1984年作为集体会员参加国际政治学会,1985年又进入该学会的执行委员会。政治学刊物逐年增多。全国性刊物有《政治学研究》、《国外政治学》、《中国行政管理》3种。地方性刊物也有10余种。研究工作主要涉及到了以下几方面:(1)政治学研究的对象、体系和方法。(2)政治制度